

三大起义创建人民军队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争斗，达成妥协，宁、汉两个“国民政府”实现合流。在此基础上，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4月，国民党军队继续“北伐”，夺取奉系军阀张作霖占据的地盘。6月，张作霖退出北京，在途经皇姑屯时被日军密谋炸死。其子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司令，于12月29日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这样，北洋军阀不再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继续存在。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工农大众，开始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宁、汉合流之后的国民党，已经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是变成了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改变，中国仍然需要进行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困难。

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野蛮屠杀。据党的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著名活动家和领导人英勇牺牲。党的组织只能全部转入秘密状态。许多党的组织一再遭到破坏。一些人对革命悲观失望，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或共青团。有的人甚至向敌人自首，出卖党的组织和党员。据1927年11月统计，党员数量由党的五大召开时的近5.8

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工会和农民协会到处被查禁、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沉。

严酷的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低潮，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严重危险。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敢不敢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

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失败后的新方针。

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两万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四个多小时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8月3日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这样做是准备同广东东江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汇合，进军广州，占领整个广东，并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北伐。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汇合；主要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次起义

像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南昌起义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着重批评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在发言中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提出了整顿队伍、纠正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及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新方针，使党在政治上大进了一步。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和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这次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左”的错误。党内“左”倾情绪在这次会议上虽然是次要的，但其发展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危害。

八七会议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8月9日，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各路武装5000余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于9月9日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开始是以攻打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的，

起义军最初曾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由于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损失严重。这时，毛泽东果断地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9月29日，起义军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改编，史称三湾改编。前委将已不足千人的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设党委；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这些措施开始改变起义军中旧军队的习气和不良作风，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经过三湾改编，起义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位连长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又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陈郁等领导。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等参与了对起义的指导。参加起义的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以及市郊部分农民武装。起义爆发后，乘国民党军主力外调的机会，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地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颁布了维护工农权益的法令。由

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无力坚守广州，担任起义总指挥的叶挺主张趁敌人主力尚未开回广州前将起义部队撤出，这个正确主张遭到诺伊曼反对。起义军同敌人进行了顽强战斗，终因敌众我寡，在起义的第三天即告失败，张太雷和许多革命者英勇牺牲。退出广州的起义军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参加革命斗争，一部分到广西左、右江一带同农民起义军汇合。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

除了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党还先后领导了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的武装起义。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一部分很快地失败了。它们的失败证明：在中国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行不通的。而一些坚持下来的起义军，大多活动在位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农村地区，这就为后来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尽管这时党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革命形势依然处于低潮。然而，中共中央没有认清形势。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这次会议后，一些地区盲目暴动带来的惨痛失败，使中共中央冷静下来重新考虑问题。1928年4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通告，承认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至此，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为什么革命处在低潮而党内却会出现“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呢？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和许多共产党人对中国政局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满腔愤恨和复仇渴望，像一

团烈火燃烧在许多革命者的胸中，使他们容易产生一种近乎拼命的冲动，并把一部分先进分子的认识水平误看成是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由于国内白色恐怖非常严重，难以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开会，中共中央报请共产国际同意后，决定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

1928年6月18日至21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等一系列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大会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过去，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这是党的工作方针的一次重要转变。

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根本问题所做的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的情绪，实现有关认识和工作转变，对中国革命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党的六大也有不足，主要是：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认识到建立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仍然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敌人，对中间派的作用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应对政策。

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党的六大后的两年间，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大革命失败后似乎已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经过艰苦的斗争，又重新壮大起来了。

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非常注意党的建设，党的组织有了较大发展。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党员已达到6.9万人，1930年3月，又增加到10万多人。1930年底，党在全国17个省恢复了省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造了从事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中共中央在实际工作中强调必须切实地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力求使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党的干部要做到“职业化”和“社会化”，使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六大后，工人革命力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到1929年底，全国赤色工会会员及其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共有近四万人。农民抗租、抗粮、抗税的斗争，城市贫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以及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等，也都有所发展。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加强了对特科工作的领导。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特科在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配合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案例：八一建军节的由来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这次起义，在历史上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还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不畏强敌、勇往直前的精神。用实际行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主义，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

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可以说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城市。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新中国成立后，将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